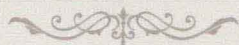




意识形态的终结

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美] 丹尼尔·贝尔◇著 张国清◇译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意识形态的终结

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



[美] 丹尼尔·贝尔◇著 张国清◇译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字:01-2013-328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意识形态的终结:50年代政治观念衰微之考察/丹尼尔·贝尔著,张国清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161-1978-5

I. ①意… II. ①丹…②张… III. ①政治—研究—世界 IV. ①D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309476号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 by Daniel Bell .
Copyright © 1960,1961,1962,1988,2000 by Daniel Bell.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Through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王 茵
特约编辑 韩国茹
责任校对 王雪梅
责任印制 王炳图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158号(邮编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中文域名:中国社科网 010-64070619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3年7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7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34.5
字 数 585千字
定 价 78.00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电话:010-6400979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社会发展译丛》编委会名单

主	编	李汉林	赵剑英		
编	委	渠敬东	折晓叶	沈	红
		葛道顺	钟宏武	高	勇
项目统筹	王	茵	杨清媚		

《社会发展译丛》编辑部

主	任	王	茵		
成	员	夏	侠	喻	苗
		孙	萍	韩	国茹

献给悉尼·胡克

推荐语

《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摒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

——赵一凡，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意识形态的终结》，最有影响、最有争议也最受误解的讨论 20 世纪 50 年代之专著，当代思想史当之无愧的核心读本。

——Alan Brinkley，哥伦比亚大学历史教授

一个人要是不深谙《意识形态的终结》的论题，就算不得有政治修养。

——Theodore Draper，美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

《意识形态的终结》集哲学思辨性、文学人文性、历史趣味性和科学严谨性于一身，成为 20 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经典。

——张国清，浙江大学政治学教授

2013 年中文版译者序

——待价而沽的良知和思想的价值

哈佛大学政治哲学教授迈克尔·桑德尔担心：“有些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但是现在，用钱买不来的东西已经为数不多。今天，几乎每一样东西都可以待价而沽。”^① 由于人们模糊了价值和利益的差异，自由市场法则已经超越自由市场领域，向几乎所有日常生活和社会生活领域渗透。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如公民的政治资格、社会身份、入学和就业机会、就医和医疗保障机会、基层公民权利，等等，都可以用货币单位来交易。其中，最令人忧虑的莫过于权力、良知和思想的待价而沽。

权力是不得“待价而沽的”公共善。按常理，权力最应当受到严格的监督和约束。中国先哲早就发出“苛政猛于虎”的警告。“苛政猛于虎”是“权力滥用”的现实表现，其根源在于权力的币值化。“待价而沽的”权力虽然理论上站不住脚，但是作为现实效用原则，权力寻求对等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必须给予认真对待。

至少从道义上讲，权力不得“待价而沽”，那么，与权力相比，人的良知可以待价而沽吗？人的思想可以自由买卖吗？谁是买主，谁是卖主？谁来决定良知或思想的价值？什么是思想市场？假如意识形态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思想市场如何开展？假如思想不能自由流通，思想市场还会存在吗？自由开放的思想市场根据什么规则运作？如此等等，这些是我们谈论思想观念、智慧产品、文化产业、传媒市场时常常涉及的话题，而它们又总是与同一个核心概念“意识形态”纠缠在一起。

现在，借丹尼尔·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2000年修订版出版的

^①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New York: D & M Publishers, Inc. 2012), p. 3.

机会，我想重提这些问题，至于答案，则留给读者和研究者去探讨。

—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是当代美国著名社会思想家、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贝尔著作等身，代表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1961，1988，2000）、《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标志着贝尔在不同时期学术研究的不同侧重点。贝尔是一位综合性思想家，其学术活动同时涉足经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等专门领域。借用赵一凡先生的说法，哈佛学生戏称贝尔为一座“圣三一学堂”，以“嘲讽”其渊博学识（贝尔生前长期居住在哈佛神学院边上的一幢别墅里直到去世），这使他在众多领域具有发言权，且产生了广泛影响。

《意识形态的终结》是20世纪50年代西方学者对冷战在观念上作出的直接反应。贝尔对当时主流意识形态作了全面介绍和评估，较为公允地展示了当时思想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整个场景。贝尔看到，东西方严峻的意识形态对垒，导致思想市场实际上被人为割裂为几个相互封闭的市场。两大阵营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全面对抗，导致现代世界的高度分裂。贝尔认识到，这种冷战情形是不可持续的，于是便有了《意识形态的终结》。

《意识形态的终结》的核心主张是，发端于19世纪人道主义传统的普遍性意识形态已经走向衰落，新的地区性意识形态正在兴起。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存在的“左”“右”论战已经丧失意义。《意识形态的终结》对美国社会阶级结构变化、职业结构变化、社会流动、劳工运动、犯罪浪潮、权力腐败、政治意识等问题作了新颖的社会学剖析，对20世纪后半个世纪的政治思想论战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当今世界格局具有重大预见力。在2000年版的新版序言里，贝尔表达了对人类未来的深切忧虑：在挣脱意识形态沉重枷锁之后，东欧许多地区及其他地方将重返种族冲突和宗教冲突的老路；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世界正经历重大的政治分裂；各族人民追求自我认同，有可能倒退到更加原始的状态。它是唤醒世人躲避普世性意识形态陷阱的警世录，被西方媒体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学术经典之一。

赵一凡称赞《意识形态的终结》：“这本天问集，仿佛尼采喊出‘上帝已死’，引起舆论大哗。其划时代意义在于：它带头指示欧美思想危机，由于摈弃马克思主义，西方人思想枯竭，惶惶不知向何处去。”^①在我看来，《意识形态的终结》集哲学思辨性、文学人文性、历史趣味性和科学严谨性诸多优点于一身，是一部非同一般的学术经典。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采用的是文学文献和社会科学文献的综合分析方法。文学文献的引用增加了著作的可读性，丰富了著作的历史文化底色。社会科学文献的大量参照，尤其是科学数据的精确引用，保证了著作的可信度。穿插其间的大量社会历史事件，加上顺手拈来的人物典故，添加了著作的趣味性，使它成为一部非同一般的政治思想读物。作者在书中同时涉猎文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等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众多领域，而他对每一个专题都能够作出精确无误的把握和恰如其分的评价，这的确令人叹为观止。

二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一方面导致了以纳粹德国为中心的法西斯同盟的失败和解体，另一方面导致了反法西斯同盟的瓦解和欧洲的分裂。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全面对垒，世界进入冷战时代。而这种分裂和对立的种子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经埋下。丹尼尔·贝尔对此作了如下评论：

实际上，自由主义者有意贬低共产主义问题的重要性。杜鲁门政府的矛盾立场加深了这些混乱，并且增加了恐慌：一方面，政府领导人，包括杜鲁门本人在内，都低估了过去共产主义渗透的严重程度；另一方面，政府放任安全条例的滥用，那个条例无视个人自由和权利。对韩国的入侵、对中国和苏联共产党的情绪化反应，那个反应把矛头指向了国内的共产党；特别是惠特克·钱伯斯对共产党人进入政府担任要职和存在间谍网的揭露；加拿大间谍调查、对英国人阿伦·南梅的审讯以及罗森柏格案件中对苏联窃取美国原子

^① 赵一凡：“他见证了美国世纪”，载《东方早报》2011年2月20日。

秘密的披露，所有这些都大大强化了国内的紧张气氛。^①

世界的分裂具有意识形态的根源，冷战的双方都有责任。与右翼知识分子一味指责苏联不同，在“诚实的错误”一文中，美国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披露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关键时刻，坚定反共的极右力量代表、美国《时代》周刊外事编辑钱伯斯对苏联关键新闻报道的篡改、控制和封锁。罗蒂写道：

钱伯斯曾经帮助说服美国舆论，一旦把希特勒安顿好了，希特勒必定会向斯大林开战。在一个关键的年份——1944 年年中到 1945 年年中，作为《时代》周刊外事新闻编辑，他无情地篡改甚至简单地丢弃外事新闻记者撰写的报道，因为那些报道矛盾于或削弱了他想要《时代》周刊传递的反共信息。

比他的编辑工作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钱伯斯成功地说服亨利·卢斯，推行强硬的反共路线，所有卢斯出版物最终都采纳了这一路线。钱伯斯为雅尔塔会议拟写了一篇诋毁报道，卢斯根本不相信它会发表出来。到了 1945 年，他同样真诚地怀疑，正像拒绝奥威尔《动物庄园》的各出版商野蛮地对待奥威尔那样，我们是否会野蛮地对待斯大林。像那些出版商一样，卢斯仍然希望有机会，把苏联和民主国家之间战时合作扩大到战后。他们不想做将妨碍这个希望的任何事情。

最终，钱伯斯的文章仍然登了出来。替卢斯工作的大多数记者向钱伯斯爆出了最猛烈的抵制怒火。亨利·华莱士在 1948 年总统竞选中表达了许多美国媒体在 1945 年持有的意见。华莱士在那一年赢得的百万张选票，见证了美国舆论就斯大林和战后世界性质存在的分歧。那个分歧在左翼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其明显。他们既为美国对待列宁时期的苏联感到羞耻，又合理地担忧，反共政策将被共和党利用，用作尽可能废除新政的借口。这些人实际上很勉强地支持杜鲁门主义，或接受乔治·凯南关于有必要包容苏联的意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vi.

见。钱伯斯完全理解这些华莱士铁杆支持者的心理状态，他要尽量改变它，他取得了重大成功。三年以后，卢斯迫于同事抱怨的压力，把钱伯斯从外事新闻岗位上撤了下来。但《时代》周刊的观点已经成为如钱伯斯所愿的那个样子。在卢斯组织内部，当时的媒体核心层，钱伯斯输掉了一次战斗，却赢得了战争的胜利。^①

这个例子说明，在所谓新闻自由的美国，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利益集团操纵新闻和公共舆论。美国政府及其利益集团对后来日益加剧的东西方不信任、猜忌和紧张，冷战的逐渐升级，负有很大责任。东西方冷战的逐步升级，正构成《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国际社会背景。

三

贝尔在《意识形态的终结》1988 年英文版的“跋”中，长篇回顾了 20 世纪 40—50 年代发生在西方知识分子阵营内的意识形态争论，贝尔多次提到一些右翼知识分子扮演的特殊角色。贝尔自称是文化上的右翼知识分子，但他是政治上的左翼知识分子或进步人士。这一点从他一再主张的自己的政治思想来源中得到明示。贝尔把《意识形态的终结》题献给悉尼·胡克，具有深刻的政治寓意。

贝尔在“致谢”中特别提到思想导师悉尼·胡克对自己的人格和思想产生的决定性影响。

无论如何，在人格思想上，我最应当感谢悉尼·胡克。他教会我鉴赏各种观念。虽依常理，我从未做过他的学生，但在与他共事过程中，在与他作偶有争议的丰富思想交流中，我受之于他的实在太多。尽管我不赞成胡克的某些偏好，但我分享着他的绝大多数思想关切。我仰慕其人格和思想勇气，无论事业有多么不顺，他都一如既往，拒绝逃避战斗，拒绝抛弃朋友。但凡受其传道授业者皆知，此乃一代宗师耳。^②

① 理查德·罗蒂：《文化政治哲学》，张国清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71—72 页。

②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49.

胡克是实用主义者杜威的得意弟子，当时担任纽约大学哲学教授和哲学系主任，又是美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胡克用实用主义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是一位在实用主义阵营和马克思主义阵营两面都不讨好的美国哲学家。但他认为自己是为数不多真正读懂马克思的美国学者。1947年，胡克对自己的马克思研究作出了如下自我评价：“在过去的二十年间，我提出了一种对马克思的解释，它与关于他的基本学说的流行观点和理解相冲突……假如我对马克思的意思的理解都是正确的话，那么我也许将是世界上唯一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把在美国探索和传播“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当作一项事业，这是贝尔评价胡克“无论事业多么不招人待见”所指的对象，也是贝尔对胡克在人格和思想上表示敬佩的原因。在晚年自传中，胡克回顾了《意识形态的终结》在那场著名文化争论中扮演的思想解放角色，并称赞贝尔是那场争论的出色领导者：

在丹尼尔·贝尔的思想领导下，以米兰大会为开端，该大会组织了达到任何一所名牌大学都将引以为荣的思想水平的二十四场国际研讨会，这些研讨会讨论了大量论题，其中最著名的当数“意识形态的终结”。它与其说表现了真实的事态，不如说表达了人们的希望。^①

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争论，表达了西方知识分子对人类文化正在面临极权主义威胁的担忧。贝尔的工作无疑是在胡克的影响下进行的。因此，在写作《意识形态的终结》时，贝尔又自称是马克思和杜威的弟子，就不难理解了。贝尔说：

本人的导师是杜威和马克思。我之所以认杜威为导师，是因为他坚持不从结构（习惯）开始，而从问题开始，从这样的问题开始：某件事情何以会产生问题，事物何以处于流变之中，人们做了什么，等等。我之所以认马克思为导师，是因为他看到了意识形态和权力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因为他对历史的重视，对作为变革环节

^① Sidney Hook, *Out of Step: An Unquiet Life in the 20th Century* (New York: Harp & Row Publishers, 1987), p. 447.

的危机的重视，对政治的重视。他认为，作为一种活动，政治深深地扎根于具体利益中并体现在各重大战略中。^①

贝尔把马克思和杜威当作自己的思想导师，更自称是胡克的弟子，这样从马克思开始，经过杜威，一直到胡克，贝尔清晰地交了自己的哲学和政治思想的主要来源。贝尔是进步的有良知的世界主义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对当时美国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反省和批判，并不逊于他对当时苏联的全面反省和批判。

四

我们今天回过头来看，《意识形态的终结》虽然写于东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严重对立时期，但它也正好是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寻求自己的发展道路时期。表面看来，它与中国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是对立的，但实际上，中国谋求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发展道路，正是贝尔所希望的第三世界地方性意识形态发展的新趋势。

《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之后，意识形态并没有马上走向终结，在一定程度上，冷战的紧张气氛反而有日益加剧意识形态斗争激化的趋势。1972年，布热津尔斯基发表《不战而胜》，1989年弗兰西斯·福山发表论文“历史的终结？”，并在不久出版了同名著作。20世纪90年代，塞缪尔·亨廷顿发表《文明的冲突》。^② 这些著作在当时都曾引发广泛争论。透过其争论的表面，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贯穿其中的一条主线，即西方社会尤其是美国冷战思维的轨迹。“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既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冷战思维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同表现，也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贝尔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美国社会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48n.

^② 1993年夏季，哈佛大学塞缪尔·亨廷顿教授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上发表“文明的冲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一文，三年后，该文扩展为以《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World Order, 1996)为题目的著作。

并不是没有产生过马克思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甚至共产主义者，但是这些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最终都不成气候。一些原来主张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社会活动家、知识分子，最后要么半路退出，要么走向反面，要么停留在理论和思想层面的反省，探索美国何以产生不了社会主义运动或工人革命的原因。贝尔认为，之所以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美国面临的问题，不是通过意识形态的认同或阶级立场的简单站队就能解决的。教条的马克思主义，正统的意识形态和阶级分析方法不适用于美国社会，美国的问题不是工人阶级的强大和自觉，而是工人阶级被日益成长的工薪阶层和中产阶级所取代。随着中产阶级成为美国社会的主导阶级，加上大量外来移民的不断介入，使得美国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可能性和要求被一再地延后，直到最终被完全取消。

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从 20 世纪 30 年代开始，美国历届政府推行的社会改革，美国民权运动的兴起，对缓和美国社会矛盾所起的作用。各种社会思潮和正义理论对引导社会朝着良序社会发展所起的作用。

有意思的是，丹尼尔·贝尔先于约翰·罗尔斯、迈克尔·福柯和迈克尔·桑德尔看到了杰米里·边沁圆形监狱（功利主义效用原则的最完美体现）在现代社会基本制度建构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先于罗尔斯、福柯和桑德尔，丹尼尔·贝尔看到了杰米里·边沁设计圆形监狱的政治社会学意义。贝尔写道：

对于边沁来说，工厂和监狱的这种同一化也许是非常自然的。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监狱和工厂借助功利主义的整齐和效率观统一了起来。功利主义的根基——边沁给予阐明的这种新的行为样式——是一种对秩序的狂热寻求，并且是对于各种动机的精确计算。假如确切地给予测算的话，那么那种精确计算将刺激每个个体达到一种恰当的诚实和工作的程度。功利主义提供了一个关于合理性的新定义：它不是理性的规则，而是测量的规则。有了它之后，人们自身就可以受到约束。^①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28 - 229.

贝尔接着引用了阿尔多斯·赫胥黎的一个说法：“在今天，每一个有效率的办公室，每一个时新的工厂，都是一个圆形监狱。在其中，工人们痛苦地……意识到自己正被囚禁于机器之中。”贝尔进而评论道：“如果说这种谴责是真的，那么它向美国提出了最为沉重的控诉。”^①同样，福柯把边沁的圆形监狱称为人类心灵史的一个重大事件。与赫胥黎和贝尔不同的是，福柯从空间角度来解读圆形监狱，他把圆形监狱看做一种功利主义的空间哲学。福柯说：

政治实践和科学技术对空间问题的双重介入迫使哲学只能去研究时间问题。从康德以来，哲学家们思考的是时间。黑格尔、柏格森、海德格尔（莫不如此）。与此相应，空间遭到贬值。因为它站在阐释、分析、概念、死亡、固定，还有惰性一边。^②

福柯虽然实现了在解读圆形监狱上从时间关系向空间关系的转换，但是并没有改变圆形监狱的基本哲学内涵。福柯几乎是原原本本地搬用了赫胥黎和贝尔对边沁功利主义哲学的解读。

贝尔承认，当代美国首先是一种机器文明，一种典型的注重效率的功利主义文明。在《意识形态的终结》中，他用多章篇幅讨论了美国工人阶级实际生活条件的改善，美国工人运动的逐渐衰落。他认为，功利主义从根本上有利于提高美国工人阶级生活条件和社会地位。在经济领域，贝尔仍然相信自由市场在有效配置资源方面的基本合理性。

五

同近代启蒙、近代科技一起发展起来的一个重要政治成就，是“意识形态”的出现。政治哲学总是带有时代烙印的，免不了同时代要求、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关系。意识形态曾经是一个贬义词，至少在马克思那里是如此。意识形态总是与国家机器联系在一起。在整个 20 世纪，意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29.

^② 米歇尔·福柯：《权力的眼睛：福柯访谈录》，严锋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152—153 页。

意识形态曾经发挥过重大的作用，甚至成为冷战时期的主要武器。政治哲学一直重视意识形态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作用。

意识形态涉及公共话语权或公共舆论问题。一方面，每一位公民都有表达自己的意见和主张的权利，即使他们的意见和主张是错误的。在社会中，不同个体的思想观念通过在公共空间或媒体的发表和传播，形成一定的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最终会影响甚至左右公民的思想和言论。因此，意识形态领域也涉及公共的重要权利。它涉及，第一，每一位公民都有自由表达自己言论的权利。第二，每一位公民有表达自己的言论的权利，但保证不了都能得到其他社会成员的认同。也就是说，公民意见的社会影响力大小存在显著差异。第三，能够在公共舆论中发表意见的公民只是极少数，与那些从来没有机会在公共媒体上发表意见的公民相比，他们在公共舆论中占有明显优势。第四，在公共舆论中，会形成主流公共舆论，它们对社会的影响超过了其他舆论的影响。

显然，在现代社会，国家或政府直接或间接地控制着意识形态或公共舆论。公共舆论是不同社会力量的较量在思想观念层面的反映，力量的强弱不表示观念的正确或错误，但总是涉及不同社会利益集团的要求。政府总是千方百计控制公共舆论，以便使公共舆论更好地为政府服务。意识形态体现了国家意志。无论是专制国家，还是民主国家，都是如此。在战争年代，国家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尤其严厉。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尝试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和开放，东欧社会主义阵营在1989年前后的迅速崩溃，美国“9·11”事件的实际发生，中东地区的长期动荡不安，所有这些事件进一步证实了贝尔当年的预言。2000年，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出版40年之际，贝尔写了一篇以“新世纪续写历史”为题的新版序言，对“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的关系作了澄清。他在文中特别提到：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20世纪以宣布两个终结——意识形态的终结和历史的终结——而告终。两者看似相似，实则相去甚远。意识形态的终结，是历史的回顾，而不是历史的终结。历史的终结，是谬论的成全，而不是意识形态的终结。^①

①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xvi.

贝尔的态度非常明确而坚定，他是真正的“意识形态的终结”派，认为世界应当早一点结束冷战状态。“历史的终结”是“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反面，因为福山仍然纠结于历史的“唯一性”，人类历史方向的无法选择性，甚至是人类苦难的不可避免性，仍然把 19 世纪以来的普遍主义思想强加于整个人类社会。这是贝尔无法容忍的。

在贝尔之后，布热津尔斯基、福山和亨廷顿这样的西方学者千方百计地替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制度进行辩护。表面看来，其各自的观点似乎存在着矛盾，但是他们都充分暴露出了欧洲中心论或西方中心论的思想倾向。一方面，他们宣告历史已经终结，乌托邦已经破灭；另一方面，他们又拼命为自己所推崇的意识形态进行辩护，把历史的终结点引向资本主义，引向西方自由民主制度。并且，其所谓的“终结”还隐藏着这样一层含义：西方社会已经或正在走向所有的其他人类社会和民族都迟早要走向的某个唯一的目标和终点。这同贝尔《意识形态的终结》的宗旨相背离。

可喜的是，在《意识形态的终结》发表 26 年之后，中国也渐渐走上了一条告别教条马克思主义的道路。从 1978 年开始，中国逐渐摆脱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束缚，开始以实事求是和思想解放为先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全面的社会主义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核心是实事求是，就是突破旧的意识形态框框，在思想上进行伟大创新和积极借鉴。

今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全面成就，在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大胆创新，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指导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实践的伟大理论。中国人民以自己的理论创造和伟大实践，回应了胡克和贝尔的疑虑。实际上，至少从孙中山一代开始，中国就一直在摸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摸索，中国已经成功地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落后走向文明，从分裂走向团结，从专制走向民主，从独裁走向自由。更重要的是，我们找到了用来指导中国社会发展实践的科学理论。

真正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马克思主义自身一直在发展，一直在回应各种挑战。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